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一辑）

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

〔美〕斯塔斯 (W. Sacc) 著 庆泽彭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一辑）

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

〔美〕斯塔斯（W. Stace）著 庆泽彭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

ISBN 978-7-5520-1740-3

I. ①批… II. ①李…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哲学史 IV. 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30号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21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40-3/B.152

定价: 98.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美〕斯塔斯 (W. Stace) 著 慶澤彭 譯

批評的希臘哲學史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原著者序

這部書的材料以及文字的大部分，都是我在一九一九年春間的講演，不過目次爲便利起見是從新劃分的。當時聽講的人不止是學生，也有許多普通的人，大都沒有哲學的素養。所以這部書和原來的講演一樣，也不假定讀者預有特殊的知識，雖然普通教育程度是不可少的。凡是哲學上專門術語，初引用時，都加以詳細說明。對於每個哲學的觀念，尤極力儘可能方法使之明瞭易懂。但是須知我們的許多最廣大最艱深的概念都從希臘哲學裏面而來。像這些觀念本身都是很困難的，無論說得怎樣清楚，也要費思索的。要講靠着大量說明能使哲學變爲容易，那便是欺人之談。

希臘哲學就在今日也決不能算爲古物。牠的價值決不僅限於考古學和歷史學上。在這部書裏，我們所討論的是活潑潑的東西，並不是已死的東西，決非一個過去時代所留存的殘骸與朽骨。而我編成此書，也祇是爲着活人，決非爲着那些採掘化石的人。我要是不相信從希臘哲學裏至少可以找出來一點不會老朽的真理，縱然叫我在這上面犧牲我的生命的五分鐘，我也不肯的。

現代有名著作家威爾斯(H. G. Wells)在他的『最先和最後之事』(First and Last Things)裏有一段說：「我們不教青年運用其心智於所謂形而上學的問題的那不多的幾個普迅的基本的問題之上……我

們不教青年用其心智探討問題，從而矯正其心智，發展其心智。這正是希臘人的方法，我們崇拜這個民族如神明，卻是不採用他們的方法。我們對於我們的青年，不講哲學，而講哲學家；我們儘教他們讀了一本書，再讀一本書，祇告訴他們別人對於這些問題的議論是甚麼樣。我們躲避形而上學的問題，而大談具有各別的程度和性質，言語不通，環境懸殊的別人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和解答之半消化了的見解……這正如教授數術入手先講羅馬數碼的淵源，再及於住在西班牙的亞拉白數學家的歷史和動機，或教化學而先講培根（Roger Bacon），或教比較解剖學而先講奧文爵士（Sir Richard Owen）一樣地無用……時候到了，負教育之責者不能不知道所有的哲學問題，在每個人的心裏都是要從新做作一番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哲學，不是浮泛淺薄的哲學史的知識……研究形而上學的正當方法，和研究數學或化學的正當方法一樣，也是要討論人類思想在這等問題上的積聚了的和消化了的結果。」

這些話一般人是很有歡迎的，實則似是而非，斷不可當作完全靠得住的。這固然也有一部分真理，我們的教育系統藥口語的討論這個有力的武器，希臘人用之如是有有效的武器，而不用，提倡書本知識而喪失原創的思想，這實在是毫無根據的。然而就以希臘人而論，我們也須知（一）他們之所以不甚研究哲學史，也因其時沒有許多哲學史可以研究，（二）假如一人以為希臘的大思想家於組織他們自己的體系之前，不已完全通達他們的前人的思想，他便是大錯，而且（三）有些地方，對於口語的討論之太過的信任——這個錯誤正和我們的相反——也引

起了智識上的不忠實、詭辯、浮誇、淺薄、對於真理的不尊重，以及一切原理的缺乏，哲人學派的情形便是這樣。

至於以數學化學等方比哲學，這實在由於一個虛偽的見地，由於不能明瞭哲學的真理的本質，及其與數學的化學的或物理的真理的根本區別。假如伊萊托綏尼斯（Eratosthenes）估計地球的圓周如彼，而現在發見了如此，新見解便推翻了舊見解，取消了舊見解。一個是準確的，一個是不準確的。不準確的見解，我們可以完全忘記牠，拋棄牠。但是哲學進展的原理與此迥不相同。哲學的真理決不比數學，其解答可斷為確定地最後地正確或非正確。哲學的真理是逐漸開展的，在時間裏面循序產生許多連續的哲學體系，必於全部的程序之中，纔能見出全部的真理。亞里士多德的體系不僅推倒和取消柏拉圖的體系。斯賓挪莎（Spinoza）也不僅是推翻笛卡兒（Descartes）。亞里士多德乃是所以完成柏拉圖，斯賓挪莎之於笛卡兒亦然。其餘的人從來也莫不如是。伊萊綏尼斯的計算是單純地錯誤，所以我們可以把牠忘掉。然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賓挪莎，來布尼疵（Leibnitz），以及其他的體系卻都是真理的一樣的分子。他們在今日是真理，無殊於在他們各自的往日，雖然他們不是，從前也決不是整個的真理。所以他們不是單純地錯誤，已經成就了，完畢了，結束了，從而我們也不能夠把他們一筆勾銷。要把各家學說總合起來，把真理的所有的各樣分子銜接起來，而造成一單純的有機的整個體系，可以代表知識的最近的總結果，可是不可可能的，另成一個問題。不過像這樣的一個企圖從來固為人所努力不息的，但是如果對於先前的所有的體系不先有一個澈底的知識，即是，對於真理的各別的成分不先有一澈底的認識，要想了解這個企圖，

造出這樣的一個總結果，這是沒有人肯認爲可能的。而這個企圖現在也正是哲學史的一部分的目的啊！

所以任何哲學思想，如對於過去的體系不先有一澈底的研究，以爲其根基，斷然陷於淺薄而無價值。其認爲這種研究可以不需，憑着我們的頭腦可以造出各樣的東西，每個人都可做他自己的哲學家，都可照他自己的方法建設他自己的哲學——像這些觀念實在是很空虛而膚淺的。這種思想的一個很好的證例便可於剛引用的這位有名的著作家的形而上學的態度中見出。他的所謂形而上學完全根據這個假定，就是知識及其對象是並存而分開的，一個在這裏，一個在那裏，遙遙相對，而知識便是一種工具，這個工具由外執捉其對象，使爲自用。其實這裏一用到「工具」這個名詞的時候，其餘一切，包涵知識的無效在內，便都成了當然的結論。這個假定——知識是工具——我們的這位有名著作家用來實在太武斷了。他一點也不會顯明他曾覺得這是一種假定，還需考慮，或者，別人能够另是一種想法。但是一個人祇要是不懂乎浮泛地涉獵過哲學史，而是真實地受過牠的訓練，一望便可知這是一個假定，而且是一個很可疑的假定，這個假定誰也不當毫不躊躇地告人，一若其爲不可辯駁的真理。他還許能發見這是一個錯誤的假定。他定可以見出威爾斯先生思想途徑表現一種主觀主義，和希臘哲學精神衰頹時所發露的主觀主義性質上相同，這正是希臘哲學最後沒落的原因，實在是很不祥的徵候。

因此，我要勸告青年不必注意那些華而不實的議論，在形成他們自己的哲學主張之前，必須澈底地和忠實地研究和貫通所有過去的哲學進展的歷史，先自希臘，再及現代。誠然，這個目的僅憑讀一本或幾本撮要的哲學

史是不能達到的，到底必取大思想家自己的著作而研究之始可。但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終，這樣的哲學史的作用並非所以完成哲學的教養，而是所以肇始哲學的教養；把後來所須精心研究的先作一概括的鳥瞰，實爲初學下手最好的方法。不寧唯是，對於各種哲學的發展的經過和歷史的關聯之研究，在哲學家自己的著作裏也是找不到的，而在哲學史上則爲一重要的工作。

復次，這本書裏有兩處缺略，這裏要說明一下。第一，在討論柏拉圖政治學說的時候，我是根據他的『民治國』的，沒有說到『法律論』。這在一部政治思想史是不許的，縱是在一本哲學史，若對政治特別着重，也是少不得的。不過在我看來，政治和哲學的關係比較地最爲疎遠，所以對於這個题目的討論是可以從略的。此外，『民治國』一書無論著作先後，在我看來，實在顯示柏拉圖的見解，而非蘇格拉底的見解，畢竟是柏拉圖的政治的觀念的明白彰著最具特性的表現，不過這個觀念到後來因爲遷就實際，大有出入。

第二，有人說觀念論是蘇格拉底的主張，並非柏拉圖的學說，柏拉圖自己的哲學不外乎一種神秘的數論，連帶着些有神論的和別的思想。抱這種見解的，邊納特教授 (Professor Burnet) 便是一人。我不相信此說，但是在這部書裏不便詳細討論，我以爲與其語焉不詳，不如置之不論，所以沒有提到牠。這個問題和邊納特教授關於巴門尼底的解釋，其立足點也全然不同，他的這個解釋我在後面是討論過的。那是關於一種哲學的真意的說明，而這不過是關於一種哲學的創立者爲誰的問題。那是原理的問題，這祇是人的問題。那對於哲學家是極重要的，而

這僅乎對於歷史家和考古家有關係。這就如同培根和莎士比亞的問題 (Bacon-Shakespeare question) 一樣，真正愛戲劇者實在不必管這個問題。無疑的，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問題對於考古學家是很有功的，但是無論觀念論是出於何人之手，根本上畢竟沒有多大關係，我們所需要的是了解這個學說，正確地認識牠在哲學上的價值。本書注重各種哲學的觀念、真理、意義和關係，至於考古學上的爭辯，一概從略。本書固不僅為哲學的概念的討論，且亦為哲學史。但是這裏所謂史之意義是把哲學思想就其歷史的繼續和關聯而順序說明，期於使人能明哲學演化之遞嬗，因為思想是向着一個一定的目的而進展的，其逐漸地和穩定地發達而臻乎理想主義的頂峯，繼而衰落，終於崩潰，其一貫的軌迹不僅乎是深堪玩味的歷史的現象，而且對於這個軌迹沒有一個具體的概觀，要想對於哲學本身得一正確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這個緣故，威爾斯那便一定是對的，而我個人就定必完全拋棄照着歷史的秩序討論的方法咧。最後，讓我聲明這部書稱做『批判的』的意義，其為批判的是不在年月時日卷帙文字及其他相似的考據上，祇限於哲學的概念上的。

我在這裏謹致感謝於錫蘭 (Ceylon) 高爾 (Galle) 麻亨德 專門學校 (Mahinda College) 前校長握篤華 德先生 (Mr. F. L. Woodward, M. A.)，承他們的盛情，幫助我編成了專名索引，還給了我不少別的助力。

一九二〇年正月著者序

譯者序

希臘哲學爲西洋哲學之淵源，現代歐洲一切思想的胚胎，大抵都包涵在希臘哲學之內，實際上，晚近西洋文明也就可直稱爲希臘文明。所以要想研究西洋思想，對於希臘哲學，非先有一個相當的認識不可。當然我們如欲作進一步的研究，必須取各大哲學者的原書讀之纔行，僅看一本哲學史是不夠的。不過在初下手的時候，先作一個歷史的研究，把全部的進程的各階段和其一貫的關係作一個鳥瞰，是很可以幫助我們後來的研究的。尤其是研究的時候要取一個批評的態度，這實在是探求一切知識的一個極重要的條件，初學者必須很早地養成這種習慣纔行。譯者作成此書一半是自己練習記憶，一半便是要供給這種需要。

譯者很慚愧，自己的學問很淺，從未出國門一步，文筆是很笨拙的，而且譯這本書的時候，因爲環境的關係，手邊一本參考書也沒有，以致有幾個佛教的專名的中文譯名沒有尋出，祇得譯音，其他錯誤缺漏的地方一定也是很多的，還望讀者和朋友們不吝指教，俾將來可以有改正的機會，這實在是私衷所至切盼禱的。

十九，四，十，慶澤彰。